



南川土革系石记

韦山银 著

南川“文革”亲历记

韦山银 著

南川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增刊八)

二〇〇〇年十二月

《南川文革亲历记》弁记

韦山银同志，是新中国建立前参加革命的同志。南川解放后在南川历任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领导工作。离休前系县人大副主任。韦山银同志离休后参加老年诗书画研究会，爱好写诗、书法和撰写回忆录，已内部出版回忆录三本，这《南川文革亲历记》是他写的第四本，由宫家和同志作序，拟编入我会《金佛山诗稿》增刊(八)，仍然内部出版，供老同志阅读参考。

南川市老年诗书画研究会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八日

前　　言

一九六六年，正当中国人民高歌猛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刻，“文化大革命”降临了。整个中国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民主被践踏，法制遭到破坏，人身受到侮辱，权利被剥夺。祸国殃民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了一个个反革命事件，揪斗一批批干部和群众，打倒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之风比比皆是。冤狱遍地，浸透人民的血和泪；民气大伤，国力衰惫，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仅从审判“四人帮”起诉书上列出来的数字统计，受到残酷迫害的干部就有七十多万人，被迫害致死的3万4千多人，而不同程度受到株连的达一亿！在那“史无前例”的日子里，九亿人民只能在恐怖的气氛中痛苦呻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它本来就是一奇特的大冤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象狂风暴雨，席卷了全国大地。当时，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斗争会、讲用会、声讨会；看到遍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大小字报、大标语、漫画；看到身穿黄军装、手举“红宝书”的青年学生狂热、奔走、串联和呼号；看到突然从全国各地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造反组织”；看到这些造反组织之间的抗争，辩论、分裂、以至武斗烧杀；看到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遭到冤屈、打击、迫害和摧残，以至枪杀。当时，人们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得不到宪法和法律及党章的保护，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并失去了一切申

辩的权利？为什么昨日的“接班人”，“伟大的副统帅林彪”，竟背叛了党和国家，背叛了人民的道路？

一九七一年的“九·一三”事件，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引发了一场无声的思想解放运动。林彪的灭亡使当时的人们感到怀疑、惊异、欣喜、振奋，开始看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一线微弱的曙光。更多的人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开始认真地探索“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出现的一切奇怪现象。从“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终于使人民通过自己头脑的思考，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的目的，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时间，发动的一场大错误的运动。

历史在这里停滞了，倒退了，沉默了。

诚然这种倒退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段插曲。但它毕竟是浩劫，是悲剧，是永远不能忘却，不该忘却有苦难的十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不允许这种浩劫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将近半个世纪了。从今天的角度看，只是刚刚过去的“历史”。但正因为它是刚过去的历史，就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历史事件参加者，对其中一些事件的评价直接涉及到现在现实的问题。第二，因为事件刚过去，很多事情往往还须要一段时间探索才能更冷静而客观分析和研究问题。

在走进新时代，跨入 21 世纪的今天，“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年轻一代人怀着浓厚的兴趣希望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切；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的人无不感到有必要把这段历史用文字记述下来，有必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用科学的眼光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的一

切。

“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亲身经历者又是耳闻目睹者，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这一代。若都长期默不着声，再过一些年岁，后一代人只能道听途说而已。所以，要求我们把这一代人所遭遇的灾难以及流血牺牲留给历史、留给以后的人们。所以，有些事，忏悔也好、批判也好，承担什么报应也好，都是由我们来做，自觉地掮起这历史的责任来。不管怎样，历史是历史，绝不会因为人的一厢情愿而消失。

今天，我们这些人之所以回首往事，并将这所有的一切详细叙述下来，只有一个愿望：愿所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铭记这一人间悲剧；愿所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岁月的人知晓这人间悲剧；愿苍天有知，永远不要让这一人间悲剧再度重演。今天，我们能说这些写这些，都是应该归功于邓小平理论的伟大胜利！

黑暗的一页已经消逝，中国人民又一次迎来了光明。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为的是记取历史的教训，振奋革命精神，高举邓小平理论，夺回失去的时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向前进。

读者的话(代序)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山静日长仁者寿，荷香风善圣之清。

这两句话是中国人的古训，韦山银同志就是凭着这样一股子强劲，不论在工作时还是离休后总是那么不舍昼夜的工作、学习和读书，也不管顺境或逆境，都是非常豁达和乐观，他共产主义的理想，离休后也没有忘怀，仍是“陋室不陋别有意，闲诗诗书写历史”。因此，几年时间送我读的三部自传似的书，这个本子是第四本了，工作时并不是文化人，离休后才进入文坛。山银同志是在读中学时的 1948 年也就是解放战争进入最紧张、最艰苦时参加地下党，创建童冠村地下支部，任支部书记，在南川地下县委和合溪区委党组织领导下放弃学业，在金佛山后麓利用自己家乡的地形和影响，积极组织青年学生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在以合溪乡小学为基地，同其他进步老师建立了读书会、图书馆、演讲会、抗丁队、农民翻身会等群众组织，团结了一大批进步青年和贫苦农民，对旧政府展开了抗丁、抗粮、抗税，反对打内战活动。在元村、合溪乡发展了许多共产党员，在党组织领导下，旧乡政府、乡自卫队、学校等都被地下党领导和控制，使金佛山后麓的合溪、元村、德隆等乡成为地下活动根据地，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南川起了很好作用。解放后，山银同南川党组织全体同志与接管南川县的西南服务团四支队二中队的全体同志胜利会师成立了新的县委政

府。山银同志被分配到德隆区工作，后成立大有区任区委宣传委员。从此，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展开了繁忙、紧张的，组织各界人士，发动农民、工人群众，接管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宣传党的政策，征粮、征税、收容国民党散兵游勇、收交地主乡武装枪支、安定社会秩序等工作。这时我军主力去成都参加围歼胡宗南集团去了，南川住军较少，当地一些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特工，及军政人员、散兵、游勇、恶霸、惯匪勾结在一起想恢复他们的天堂，到处造谣说在成都的解放军被胡宗南部队打垮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南川没多少住军，土匪在全县发起了暴动，德隆乡又是远离的县城山区，土匪暴动猖獗，山银同志家被土匪抢劫一空，并将家兄关押匪队，限三天交出共产党员，不然枪杀。山银同志在区委领导下配合解放军带领一些青年学生和农民积极分子投入到艰苦紧张的剿匪任务中去，并协助剿匪部队活捉匪首时应昌、韦绍武等。经过近半年战斗，消灭了股匪，彻底肃清了多年的匪患，全县各阶层人民拍手称快。山银同志受到了武装斗争锻炼，紧接着又参加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互助合作、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等等一系列运动。山银同志也由一个青年学生锻炼成为一位成熟的领导干部，从大有区调任城关区任区委副书记，不久又调任县委统战、工交、宣传、农工部等部的部长，并还兼任县政协副主席，后又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文革中在南川他是受冲击最大的人之一，并诬陷他是县委最红的人，是万能部长。今天说起来他为什么调任这样多部门作领导，除了山银同志工作上勤勤恳恳，钻研业务做什么工作也适应，他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哪个部门工作任务重哪个部门少领导人就调他去，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么,一干就出成绩,他从不辜负党和人民委托,从不作违心事,说违心话,干群关系融洽,待人是以诚、以德、以礼、以师的态度,也就是通常所讲“有志者事竟成”。所以干嘛行熟哪行,为什么后来到办公室呢,我最清楚,地委领导找我谈话讲了你先带工作团去涪陵参加大四清试点,结束后你到地委,其他几位常委西南服务团来的老同志也要调地区部门工作,南川县选几位本地同志接任,除陶现禄挂帅外,选几位有文化、年轻的到县委协助陶现禄工作,就这样把山银同志从农工部长位子上调任县委办公室主任熟悉下全面工作好协助陶现禄同志任县委副书记,地委组织部也派人考察了,后因文革开始就未批下去,就这样文革中他成了黑线重要人物,受冲击最大,不但造反派在精神上、肉体上摧残他、折磨他,而县委也有个别常委也胡说八道来打骂诬陷他,使其身心受到严重打击,但山银同志是豁达、乐观的,从不乱说乱道,遇事不惊的,有次我被南川造反派从涪陵揪回南川县批斗,关押招待所一间黑屋里,晚上十二点,他避开看押人员亲自来看我,我十分感动,我二人见面无拘无束的,心情也兴奋地谈到快天亮他才走了,我俩均认为当前这种不正常情况绝不能长久,我们都是几十年的党员了,工作可能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但我们个人来讲是扪心无愧的,对党对人民没有作亏心事的,他们现在的作法不合党的政策的,也不是毛主席所讲的,不可能在这场运动中把干部统统打倒,我还把涪陵一位支左领导同志找我说话时所讲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要求全国尽快把干部解放出来工作,再不能乱下去了,更不能叫那些小青年学生和不三不四人来掌权,因此,我二人都互相鼓励要宽心,不要想不通,坚持下去,除非被整死,自己绝不毁灭自己,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说话

把我们这些芝麻官解放出来的，我们共同用了一句古语结束我二人半夜谈话“领导关键在于用人，用一贤人则贤人竟至，用一小人则小人趋附”。今后国家要建设，要富强，人民要富裕才行，决不能象这样天府之国，四川倒吃进口粮了；我二人也认为我们在鸣玉乡被批斗时一位老房东女主人请我们吃饭时所讲那句话是代表了纯朴广大农民的心愿的，“他(她)说，宫书记、韦部长你们好好吃饭保养好身子，这场运动不过是毛主席考验考验你们这些老干部，老人家哪能叫那些毛孩子和不三不四人来掌权”。山银同志在打倒“四人帮”后工作干劲更足了，不论作商业工作，还是到县府、县人大均干出好成果，就是离休后，理想追求没有变，在家中除照顾害病夫人，从不拖累儿女，并支持他(她)们好好工作，自己还抽时间收集资料，整理材料进行创作，真正应了古人一句“篱居不忘兴国事”的高尚情操。山银同志出生在南川，入党在南川，工作在南川，几十年的大部份时间在县委、县政府作领导工作，对南川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了如指掌，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不但是亲身经历者而是被打倒最早，受冲击、摧残也最重，解放最晚的人之一，所以他才写出这样有历史意义，有史料价值的作品来，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人和事都清楚地记录下来了，是难得的一份宝贵史料，我建议南川市委有关领导审阅后由党史或文史部门出刊，对今后南川市两个文明建设能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

宫家和

2000年6月于涪陵

注：原南川县委书记宫家和同志特为此书作序。

读《南川“文革”亲历记》感赋

十年“文革”罪滔天，
篡党争权震寰宇。
武打文攻无法纪，
腥风血雨遍人间！

以史为鉴，万年不复！

刘天正

2000年10月14日

注：刘天正同志原任地下党东路区委书记和解放初期第七区代理区委书记、区长等职。

目 录

序.....	(1)
前言.....	(1)
一、“文化大革命”与“四清”交叉进行	(1)
二、南川红卫兵	(7)
三、破“四旧”立“四新”.....	(12)
四、南川中学第一张大字报.....	(18)
五、“血统论”与“出身论”争论.....	(20)
六、乱中夺权.....	(22)
七、“红联站”与“打官站”.....	(25)
八、召开“官家班”第一次批斗大会.....	(28)
九、被扣上头号“走资派”.....	(31)
十、第一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33)
十一、“红海洋”与“忠字舞”.....	(37)
十二、“小神仙”游街.....	(40)
十三、所谓“黄德贵事件”.....	(42)
十四、从批斗到陪斗	(44)
十五、审讯中争辩.....	(59)
十六、党外朋友——李学诗	(65)
十七、水江镇游斗.....	(73)
十八、先锋公社“肃清流毒”.....	(75)
十九、三汇公社“田坎游斗”.....	(79)

二十、太平场批斗会	(82)
二十一、大石大队“土劳改”	(85)
二十二、关于“孙、宫死党”争论	(91)
二十三、牵“黑线”	(99)
二十四、“拱猪”记	(101)
二十五、“文攻武卫”	(105)
二十六、南川县成立革命委员会	(110)
二十七、“五·七”干校	(114)
二十八、涪陵“学习班转弯子”	(126)
二十九、参加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学习班	(130)
三十、终于，等到了那一天	(135)
三十一、清理阶级队伍	(137)
三十二、清查“五·一六”、“三老会”	(139)
三十三、“九·一三”事件	(141)
三十四、农业学大寨	(143)
三十五、批林批孔运动	(150)
三十六、邓小平的全面整顿	(154)
三十七、“反击右倾翻案风”	(158)
三十八、周总理逝世	(162)
三十九、朱德委员长逝世	(165)
四十、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167)
四十一、粉碎“四人帮”	(170)
四十二、“文革”十年经济概况	(173)
四十三、揭批“四人帮”大干社会主义	(176)
四十四、看！审判“四人帮”	(185)
四十五、参加审判“刘、张反革命案件”旁听	(188)

四十六、邓小平第三次“下”到第三次“上”	(192)
四十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8)
四十八、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讨论	(201)
四十九、后记	(209)

一、“文化大革命”与“四清”交叉进行

一九六三年，县委贯彻搞“小四清”，县级机关开展“新五反”，农村反“拿摸”活动，主要进行反“和平演变”为指导思想，宣传阶级斗争日趋复杂，敌人利用“和平演变”手段，从内部瓦解党组织，腐蚀干部，妄图恢复他们的“天堂”。县话剧团编写“风华江边”的话剧到全县巡回演出。

一九六六年三月，县委召开县、区、社(镇)三级干部会，以整风精神，开展学焦裕禄同志事迹活动，推动春耕生产。并号召区、社(镇)超过《六十条》标准多划自留地、自留山，以及侵占集体土地收交生产队，自己擦干屁股，迎接“四清”工作团到来。四月中旬，县委召开党的第三届代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班子，推选陶现禄同志为第一书记。同月，涪陵地委书记孙俊卿同志组成先遣队 574 人到县级机关、区、社(镇)摸底排队工作。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引线的“文化大革命”之火，已逐步烧到南川。然而，很多人并不理解它的意义，更不会想到要让缺乏社会活动经验又易于冲动的青年人去冲锋陷阵。

五月底，南川召开县区社(镇)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县委按总政《通知》精神强调“文化大革命”必须在党委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

六月六日，县委与四清工作团党委作出决定：(1)成立南

川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由县委第一书记陶现禄等五人组成，由陶现禄任组长。（2）南川“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卫生系统。（3）县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与“四清”运动结合进行。

南川中学在批判“三家村”的同时，部份师生把矛头直对学校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为代表的领导班子及部份老教师。批判所谓“夏家店”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四清工作团党委，县委从县级党政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到校，加强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自此，在南川中学吹响了全县“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号角。由于工作总团党委和县委犹恐打乱即将开展的“四清”运动的部署，就决定该校于六月底提前放暑假。

六月十五日，县委召开 435 人参加的历时 10 天的三级扩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部份精神；贯彻开展运动的有关文件；学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和贯彻南川县“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全县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

七月十一日，涪陵地区南川四清工作团，由涪陵、丰都、垫江、酉阳、南川五县和涪陵地直机关驻军中抽调干部 4759 人组成，来县进驻单位。全县设四清工作总团、区、社（镇）和直属机关分团，公社和县级各单位派工作队。先是以贯彻中共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全面开展“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在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下达后，改为“四清”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交叉进行。《二十三条》虽然对 1964 年下半年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

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它进一步明确规定社教运动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的观点。

工作总团党委和县委为体现“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教界开始，决定中学教职工和应届高中毕业班学生集中于南川中学，小学以区为单位集中于当地小学，文化系统如文化馆、书店、文工团、电影等单位集中于县文化馆，县医卫部门集中于县人民医院，分别派驻工作队，以“四清”运动为主，结合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整个运动虽结合批判所谓“三家村”、“旧教育制度”、“文艺战线上的修正主义”，批判所谓“彭、罗、陆、扬反党集团”，但主要是内外结合发动群众，要参与运动的人检查、交待、批判、斗争，“洗澡下楼”，人人过关，重点解决干部问题和全面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认清形势，打退“封、资、修”势力的猖狂进攻，以纯洁干部队伍，巩固无产阶级政权。

“四清”运动在全县城乡如火如荼地深入开展。但人们对全国六月以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形势，特别是北京发生的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各种报刊发表的言论，实质是把矛头向党中央“第一线”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制造舆论。当时多数人是对“文化大革命”还很不理解，而对这“左”倾思潮的急骤发展，来势汹汹，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也预感到一场大的风暴必将在南川降临。

八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即《十六条》后，工作总团党委、县委立即向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由党内到党外贯彻学习。各单位学习贯彻《十六条》采取“讲、学、揭”的方法：讲运动的目的、意义及依靠的力量；掀起